

身份的迷失與認同

——也斯小說的一種讀法

王璞

也斯在他的《書與城市》一書的序中這樣說：“比較不同的書本，猶如比較城市，書本有書本的矛盾，城市有城市的，找尋一種觀看的方法，城市是書本的背景，影響了書本的產生。”也斯小說的書名多次提到城市或者含有某一城市的名字，許多也斯小說的評家都注意到這一點，例如艾曉明就說過“也斯是一個對城市、尤其是大都市的生活、風習、人事有著強烈關注的作家，換句話說，是一位都市意識強烈的作家。”〔註 1〕但是我覺得也斯的小說所關注的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城市，而是以一個特定的城市為圓心而鋪展開的對其他城市的觀看，這個特定的城市就是香港。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也斯是地道的香港作家，在他的小說裏始終貫穿的主題是對於香港這個城市的思考，過去與現在，文化生活與價值觀，愛與恨，幻想與真實，都是香港的，而在這種種之間最為明顯的一條主線，便是對於香港這個特定城市所面臨的身份迷失與認同的思考過程。

葉輝在《三魚集·序》中說：“也斯小說的魅力在於內容的複雜性和包容性，也在於形式的新鮮感和表現能力。”〔註 2〕因此曾有多位評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對也斯小說不同的讀法和解釋，本文則嘗試從以上所提到的這條線索提供對也斯小說的多一種讀法。

—

讓我們首先來看看一般人對香港這個城市的印象：香港是中國的領土，是英國最後的殖民地之一，是一個高度資本主義化、高度現代化的城市，它的主要社會成分是中國人。而中國人中間又包括本地人、僑民及一九四九年前後從中國大陸湧來的難民，同時亦有相當數量的西方人、印度人和東南亞人。在鴉片戰爭以後，香港割讓給英國的一百

多年歷史裏，香港由一個漁港變成世界最大最重要的轉口貿易港，經歷六十年代的轉型期，七十年代本土意識的萌生，而轉變為八九十年代商業化資訊化的國際都市，它的文化內容既不可輕易地被歸納於以“中國”為本位的規範裏，也不可輕易被歸納於西方文化的規範。無論是對於中國大陸還是對於西方，香港的歷史和文化都是邊緣性的。而殖民地的教育，從來都沒有教導香港人認識他們的歷史，以尋認自己的身份。所以說，身為香港人，這種身份迷失的焦慮，幾乎是與生俱來的，而他的成長史，也幾乎可以看作是一個不斷地尋認，不斷地迷失，再尋認、再迷失，以至於確認的過程。也斯的小說，正表現了香港人這樣一種迷失與認同的文化心理。

也斯從七十年代開始寫小說，他在七十年代寫的小說大多收在小說集《島和大陸》中，不過，這一時期他所寫的最重要的小說，還是收在《三魚集》中的三篇小說：《平安夜》、《剪紙》和《養龍人師門》。他在八十年代寫的小說，大都收在小說集《布拉格的明信片》中，不過在這本集子裏也收有一些他寫於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小說。九十年代他所寫的小說中，最重要的當推長篇小說《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而在《養龍人師門》這部小說集中，除《熱浪》等四篇不太重要的小說外，全都分別收在《島和大陸》及《布拉格的明信片》這兩部小說集中。

也斯的這些小說集大多是他自己選編的，編選的原則不是根據年代，而是根據作品的內容或主題。例如《布拉格的明信片》，分為“言語”、“對象”和“地方”三輯，這三集，大致分別表現的是“言語的意義”、“人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和“異國風情”的主題。我這樣地概括主題當然十分淺顯，不過在這裏我的用意不是概括主題，而是借以說明這樣一條藝術創作原理：“真正的幻想藝術是無意識過程的產物，在這一過程中，藝術家賦予他的知覺印象以表現形式”。〔註 3〕一部作品中的一種因素或種種因素的交織可以被看作是基於人類經驗的重複出現的符號的表現。雖然也斯是位思辨型的小說家，但他顯然不是有意識地表現某一種一以貫之的文化心理，對於身份迷失與認同的思考是無意識地在他的小說中表現出來的。因此他才會這樣地編選自己的小說集。

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由艾曉明選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也斯小說集，基本上也是按照這一原則編選的。雖然艾曉明在後記中提到：“我想可以把也斯的作品分為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前半期、八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這樣幾個階段來考察。”但是小說集的分輯卻與也斯本人的分輯原則大致相同。因此之後她對也斯的作品分析基本上也是循著“都市小說”這樣一個思路進行的。

可是，如果按照創作的年代分析也斯的小說，我們所看到的卻還有另外一些東西。

七十年代也斯剛從大學出來到社會工作，先後在報館和其他商業機構工作了八年，這期間他寫作的小說數量最多，但其中的大部分還不是十分成熟，技巧上多多少少有模仿痕跡。在《找房子的人》、《斷耳的兔子》、《李大孀的袋錶》等篇中我們可以看到羅伯·格里耶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等現代小說家技巧的影子。1975年發表的《養龍人師門》是也斯小說的一個轉折點，標誌著他的小說無論技巧上還是主題開拓的深度上，都從模仿走向了成熟，師門這個古代神話人物在這篇小說中被演繹成了一位現代青年，他初入社會，涉世不深，但對他在社會中所遇到的每件事都要提出疑問，成為一位養龍人本是出於他自己的志願，但在這個職位上他卻不斷地陷入迷惘中。首先，為了找到這份工作，他就得“在這迷宮中轉來轉去，轉了三十六個大圈，走上石級又走下來，由這個部門到那個部門，見這個人然後又見那個人。”獲得這份工作以後呢，情況亦是差不多，他的上司阿吉是個跛子，可是“他總是拿著一份地圖，似乎是好意地教師門由某處走到某處去，結果總是讓他走進這所巨大迷宮的某些陷阱，走進有機關的房間、長滿倒刺的花叢或是潮濕的泥濘中去。”而阿吉向他提出的種種要求也總是令他不知所從而只好自行其是，結果終於送了命。在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阿吉向他提出了哪些要求，而他自己又有些甚麼固有的道德準則呢？

從小說中，我們知道，師門原是位補鞋人，他在他姐姐的指導下作這工作，而她姐姐對這工作的要求亦很含糊，至少在小說中我們看不到，我們看到的只是她“小心地檢視他補好的鞋子，她一對一對地細心看，看到手工做得好的，就點點頭。”除此之外，師門還有吃桃花這浪漫的愛好。他來自於自然，身強力壯。可是來到這空氣不流通的迷宮沒幾天，就傷了風。阿吉對他的要求卻是“上頭希望每個人都依照工作的規矩，隔鄰養鯨魚的阿福，他何嘗不是準時辦公，簽署文件，還寫長長的報告書呢！”另外，他希望師門的龍也能養得像阿福的鯨魚一樣能頭上戴著一頂三角帽扮小丑，對於觀眾提出的所有問題，它都以“哇哇哇”回答而博取了熱烈的掌聲，而且它還能唱流行曲。由這些描述我們知道，師門的迷失是在自然與社會之間、傳統與現代、高雅與流行之間的迷失，在這迷失中師門最後怎樣了呢？小說的最後一段，師門“頹然走出去，漫山遍野地走，不知道幹甚麼好，他懷念那條龍，但它已經不知去向。”〔註4〕

如果說在師門的迷失中我們還看不太清是一種身份的迷失，那麼，在寫於一九七七年的小說《剪紙》中，應當說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剪紙》被公認為是也斯最好的小說。已有不少的評論家對這部小說作了評論。陳炳良認為這部小說表現的是語言的無力，他說：“作者指出文字的授受雙方如果沒有一個共同語碼是不能達意的。另一方面，執著於文字的意義，也會造成悲劇。”〔註5〕

羅貴祥認為《剪紙》表現了作者對真實與虛假的思索是一種認知與尋找的過程，他說：“喬和瑤身上具有七十年代香港進入現代化過程中人們所嚮往渴望又或嘲笑鄙棄的一些東西。喬和瑤的對比，呈現了香港社會某些簡化二分的對立觀念：西方現代與中國傳統，高級文化和普及文化，甚至是階級身份的差別。”〔註6〕喬和瑤分別是小說中兩個平行發展的故事中的主角，喬被她四周的人看作是個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現代女性，性格爽朗開放，生活有品味；瑤則是個在中國傳統文化孕育下的女性典型，愛好粵曲、剪紙這些中國民間俗文化，“說一些沒有人再說的東西……美麗而遙遠的東西。”〔註7〕

艾曉明認為“作品從不同的層面展示出香港社會與文化異質多聲的特點，探詢了錯綜的文化脈絡與不同的人物個性的親疏關係以及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可能性。”〔註8〕

這些多個角度的評論一方面說明了這篇小說的容量之大，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它們綜合起來看，又可以發現另一個問題。說小說表現的是語言的無能為力也好，說小說表現的是對真實與虛假的思索也好，說小說表現的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可能性也好，如果抽出這些評論具普遍性的一面，剩下其中具體的、與這篇小說所表現的香港這個特定城市風情人物有關的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所有這些評述又都說明了一個問題：主人公們在現代與傳統之間感到自我的迷失，既不知如何把握自我，又不知如何表現自我，更不知如何實現自我。在小說的兩個平行發展的故事中，“剪紙”都是一個重要的意象，不僅是意象，還是表現自我，與人溝通的手段。然而運用這種表達手段的人物，不論是“我”，還是喬，黃，或瑤，都沒有成功，甚至事與願違，例如黃，不僅沒有贏得喬的愛，而且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健康。在他最後給喬的那封信裏，他試圖用文字向她剖析自己，但是他洋洋灑灑寫滿了一個厚厚的筆記本，從中國畫的氣韻說到西洋的藝術進化史，班哲明扯到吳爾夫，但還是沒有說清自己的意思，他“像向一池浮泛的水光說話，想用話抓緊浮影，面對面說個清楚。在那表面的晃蕩的符號下他幻見一個實在的身軀，魯莽的接觸又一再把形象打碎。”〔註9〕

不過，在這裏應當特別提出的還是小說中的“我”。我認為，“我”在小說的兩個故事中究竟是否同一個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兩個故事中的身份都一樣，既介入故事又與故事中的人物保持一段距離，與故事中的人物和讀者保持一種平行的對話關係。

這樣一種複式的對話形式為“我”在小說中的敘事角度提供了極大的自由，由旁觀到介入，由介入到旁觀，既參與著人物的思考又參與著讀者的思考。同時不斷地試圖引領人物也引領讀者走出他們心靈的迷宮。可正是在這種嘗試中我們也看到他心中的迷惘，他一時說“瑤，對於你的事情，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我不知怎樣才可以幫你，我是這麼愚笨又無能為力。”〔註 10〕一時又說“我寫稿時可以用文字表達自己，但在現實的對話裏，機會像一尾滑溜溜的魚，溜自你的指頭，轉眼消失在水波中。”〔註 11〕而他的迷惘彷彿是人物迷惘的註解：在迷惘中尋求著認同。

二

如果說在《剪紙》中身份迷失而認同的主題還不是那麼清晰可辨的話，那麼，也斯發表在八十年代的小說中，這樣的一條主題線卻是十分明顯了。這時期也斯大部分時間在美國求學，他的小說題材和場景也移到了外國。或者將異國他鄉的場景與香港的場景對照著寫。也斯談到他這個時期的創作時說：“與其他文化相遇，亦可以是在對照同異之間，回過頭去探索自己的文化身份。”確實，他寫於這一時期的小說，寫的都是各種不同的文化身份的人相遇，例如《使頭髮變黑的湯》寫的是一個中國家庭如何在美國式的西方文化環境中生存的故事，《與茜撒莉一道吃午飯》描寫的是美國第二代中國移民的後代游離於中西兩種文化間、既疏離又嚮往的矛盾狀態。《洛杉磯的除夕》則比較複雜一點，既寫到洛杉磯和香港這兩個地方的文化差異，又寫到李地和美蘭這兩個經歷與性格不同的人的身份差異，也寫到兩種社會背景下兩種不同的人生處境的對比。但綜合來看，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接觸到在身份模糊的狀態中迷失的苦惱與認同的焦慮這個主題。這些小說的人物幾乎都是身處異國他鄉的遊子，在他們身上，程度不同地帶有本土文化的烙印，在異國文化的衝擊下，既有興奮也有苦惱，興奮來自於新奇，苦惱來自於對生活嚴肅認真的態度。殷國明注意到也斯小說的故事很多發生在一個交叉的時間和地點，他指出：“不同的生活情調和交錯，不同人物畫面的重疊，不同思想觀念的碰撞，使他的小說表現出一種特殊的意蘊。”〔註 12〕他這裏所指的意蘊是小說所表現出來的情致。但我覺得，至少還應當有另外一層的意義，那也許是作者深刻思考的結果。故事發生在交叉的時間和地點，人物是浪跡天涯的遊子，都與這些小說始終貫穿著的一個主題有關，這主題，你把它理解為人與人之間尋求溝通也好，把它理解為對於多樣化人生的

體驗也好，都可以歸結於人物對於自己、作者對於人物的環境乃至身份的辨析過程。有時候通過辨析的過程這身份逐漸清晰，例如《使頭髮變黑的湯》中的玉珠、母親；有時候通過辨析這身份仍然朦朧，例如《與茜撒莉一道吃午飯》中的茜撒莉和瑛瑛。“我們反映在車窗的玻璃上，看來像一對姊妹。”〔註 13〕“玻璃”和“看來”令這認同多多少少帶上了一層虛幻的色彩，打了折扣。

也斯前後寫作了十年之久、出版於1995年的長篇小說《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無論在藝術手法上，還是在主題層面的開拓上，都可以說是他八十年代小說創作的一個總結。他自己說這部小說“也可以說是自傳體的遊記回憶錄”，是從表面的層次上來看。表面上看來，小說的中心情節線是“我”和我的一班朋友從香港到紐約、三藩市、柏克萊、巴黎等城市的遊記，但貫穿著這個遊歷過程的，是遊子們在各種外來文化的衝擊下，不斷反省自身香港文化背景，為自己的身份定位、迷離、焦慮的心理情緒線。地理環境的改變，迫使他們不斷地調整自己的位置，在將東西文化不斷地做著對比、觀照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一個獨特的自己，也可以說是一個獨特的城市，這個城市就是小說的主人公在那裏成長的城市香港。香港不同於紐約和三藩市，更不同於巴黎和布拉格，它似乎沒有過去，也似乎沒有將來，因此看上去它“是一個失憶的城市”。〔註 14〕可是比起也斯八十年代小說中的身份困惑主題更深化了一層的是，在《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中，正因為看出了這個城市的毛病在於失憶，認識到“一個人可以面對他的記憶，他才是一個成熟的人；一個國家能面對它的記憶，才可以是更成熟而開放的。”〔註 15〕才能夠努力去恢復記憶，分辨哪些是應當保存的，哪些是應當永遠揚棄的，在這個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當然，只要時間沒有凝固，這種認同的過程就不會停止。所以，作者在尾聲中寫道：“且讓我們坐下來想想，可否在這些不斷反覆折射的形象光影間尋找一個屬於我們的空間？”〔註 16〕只有在這一個相對堅實的基礎上，才可以談到重新建構過去，才可以談到如何走向將來。這一本看上去如此支離破碎的小說正是在這樣一個中心構思的向心力之下才揉和成了一個整體。而這種鬆散的結構也因此才具有了存在的理由。

三

在教當代中國文學課程時，我給學生選讀了也斯的小說，不止一位學生來找我說，也斯的小說有說不出來的那麼一種味道令你想讀下去，可是真難讀。對於接觸文學不多、二十歲上下的香港學生來說，有這種感覺應當是必然的。難讀的小說有兩種，一種是真的不知所謂，是作者自己沒想清也沒有寫清的偽現代派小說；一種是有豐富的內涵，卻必須讀者開動腦筋，參與到小說中去讀。我認為也斯的小說屬於後一種。你從多個角度去讀，可以讀出多層的含義。各層含義互相補充又互相修正。從這樣的意義上看，本文只是提供了多種讀法中的一種。或許提供了解讀也斯小說的一個參照系。這就是：也斯小說具有濃厚的香港色彩不僅因為他的小說描寫了大量的香港地方風情和文化風貌，而主要在於他小說探討的是香港這個城市和生活在這城市的人們的困惑、苦惱和思考。這些困惑與思考是只屬於香港的，因而是獨特的，而這也正是也斯小說最重要的價值之一。□

註釋：

- [註1] 艾曉明：《尋找空間·編後記》（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287。
- [註2] 葉輝：《三魚集·序》（香港：田園，1988），頁22。
- [註3] Colin Still: 《Eternal Theme》, London. 1936. P.7.
- [註4] 也斯：《養龍人師門》（台北：民眾日報，1979。）
- [註5] 陳炳良：《筌蹄之辨》、《文學散論》（香港：香江出版公司，1987），頁59。
- [註6] 羅貴祥：《大眾文化與香港》（香港：青文書屋，1990），頁69。
- [註7] 也斯：《剪紙》（香港：素葉，1982），頁44。
- [註8] 艾曉明編：《尋找空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106。
- [註9] 《剪紙》。頁90。
- [註10] 《剪紙》。頁84。
- [註11] 《剪紙》。頁58。
- [註12] 殷國明：《錯落的情致 深潛的意蘊》。刊於《小說評論》，1990年第四期，頁78。
- [註13] 也斯：《島和大陸》（香港：華漢，1987），頁80。
- [註14] 也斯：《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香港：牛津，1995），頁19。
- [註15] 同上，頁32。
- [註16] 同上，頁63。